

明清时期经济中心转移与江南市镇的衰落

——以金山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

安涛

明清时期，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下，江南市镇普遍兴起，市镇经济发达。朱泾镇依托其传统资源，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到江南乃至全国的市场网络中，成为金山区域中心市镇。在缓慢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江南经济中心从苏州到上海的转移，江南市镇呈现出不同的命运。上海开埠并取代苏州成为江南新的增长极后，传统市镇体系开始分化，部分市镇融入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体系中，得以继续发展。而部分市镇传统优势逐渐丧失，市镇的区域中心地位逐步被边缘化。

[关键词] 经济中心转移；江南市镇；衰落；朱泾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7-0139-05

安涛(1974-)，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枣庄学院政法与历史学系讲师，研究力一向为区域社会经济。(上海 200234)

明代至清前期，朱泾镇依托于松江府的全国棉纺织中心地位，其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惟茸城巨镇，朱里为冠”“明清两代，朱泾一直以松江大镇而著称于世。”并“有城市气象”。明代的陆宝在其《行嘉善道中宿朱泾》诗中这样描写朱泾：“春潮覆草半江青，长水分涂客未经。少理蚕丝多织布，百家烟火傍朱泾。”至清初，赵慎微曾作诗描写朱泾盛况，“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朱泾繁盛的主要原因是纳入到了中国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中，“江南市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跟封建自然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相协调的，市镇并不是因农村自然经济分解而产生的。

市镇在自然经济内部孕育而生，是自然经济发展的结果，并在高一经济中心的辐射影响下得以发展。当其依托的经济中心发生转移时，市镇的原有市场配置和经济地位将发生变化，“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以小农

庭为社会经济细胞，小农经济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成功适应当时严峻社会生态环境压力的经济行为准则。”当经济中心发生变化时，特别是上海开埠并成为新的经济中心时，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准则面临挑战，“经济中心的转移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出现，不论是在市镇的资源禀赋、交通条件、资本要求、技术条件，还是管理经营理念、政府的职能等方面，都对市镇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其能适应由经济中心转移而带来的新的经济发展机遇，市镇的社会经济将继续发展。朱泾镇在江南经济中心的转移过程中，其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优势逐渐丧失，“上海开埠后，朱泾镇虽处于沿海并距上海较近，社会转型却停滞不前，区域中心的地位也逐渐丧失。”其明清时期的区域社会经济中心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一、松江棉布业中心向苏州转移

江南棉纺织业兴起于松江府，松江府土布在明代已有“衣被天下”之称。清代前期，棉布染整和集散中心逐渐西移到苏州。“清代前期，苏州府城因布号集中，已逐渐取代松江府的地位，成为整个江南地区棉业集散、加工的中心城市。”“如织造布匹，向例在苏办染，并不在本邑（松江）采买”，这一变化导致了“松民失其利”。清代前期苏州逐渐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棉布

染踰业的中心，“布店在松，发买在苏”，据丁日初估计，“上海地区每天输往苏州的坯布约有 20000 之多。”“松郡各邑产布，甲于他府。昔年开张青蓝布号者数十家，通商裕课。后有移他郡地方，今仅止数号。”清代松江的大布号也逐渐转移到苏州，“雍正乾隆之间，松江以织布富甲他郡，后夺于苏州之布，而松民失其利。”由于棉纺织中心的转移，清初时，松江地区“标客巨商罕至”，“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朱泾镇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朱泾到了清代，一反那‘奉布商如王侯’的明末布业极盛时代，而其市况之衰替，与标布业之没落息息相关。”

同时更与松江的中心地位被苏州取代有着密切关系。

苏州棉纺织技术高于松江是中心转移的重要原因。江南的经济中心之所以向苏州转移，除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吴中人才之盛，实甲天下。至于百工技艺之巧，亦他处所不及。”^①卷，正是苏州的人才之盛和技术的优越，织染的棉布质量高于他郡，销路颇广，利润丰厚，吸引着布商前往苏州采买，松江自然要倍受冷落，中心的转移便是自然而然的。

松江的经济中心向苏州的转移与明末清初的战争也有很大的关系。清军定鼎后南下，苏州城躲过一劫，而松江却受到战火的洗劫，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据《乙酉笔记》记载：“宏光乙酉（1645 年）大清兵传檄至苏。都御史土国宝随至，故无屠戮之惨。”由于松江城的守军顽强抵抗，“独我松沈犹龙起义守城”，致使松江城受到极大的摧残。“李成栋率师破之，横尸遍野，妇人金宝捆载而去。其破城之初，由郡东察院延烧至秀野桥，大街东西之房，百无一存者。城中东南一带，悉为官兵所占。后卒为成栋之兵所拆，乡绅之楼台亭榭，尽属荒邱。此吾郡房屋过华，宜有今日之劫也！吾松城虽狭小，不及吴郡之三，然东西南北，非官家栉比，即商贾杂居，市物列陈，无一隙地。所谓锦绣江南，无以逾此，及遭残毁，昔日繁华，已减十分之七。”“是役也，士民在城者不下万人，悉遭屠戮，妇女色艾者，尽掳以行，所得金宝无算。”

姚廷遴在其《历年记》中也记载了松江城所遭受的劫难。“清兵自秀野桥起火，直烧至东门外。南门起火，直烧至府前谯楼，俱为灰烬。北门四周俱烧尽，存着只有十分之一二。杀戮之惨，较别郡更甚。”并且姚廷遴也叙述了松江城昔日的繁华，“余幼到郡，看城中风俗，池郭虽小，名宦甚多，旗杆稠密，牌坊满路。至如极小之户，济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无论大家小户，早必松萝芟芟，暮必竹叶青状元红。毋论贵贱男女，华其首而雅其服焉；饮食供奉，必洁其器而美其味焉。”但是此役以后，“真所谓云间锦绣，顷刻化为瓦砾之区。伤哉！伤哉！”此外，新兴的上海县也日益从松江府城吸收各种资源，“迨至嘉庆、道光年间，上海邑城已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海港城市之一，而上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则亦在这个时期逐渐由松江府城转移到了上海县城。”

二、近代上海取代传统苏州

上海地区经济的发轫是以青浦的青龙镇兴起为标志。“自汉至唐，在 0## 多年的时间中，通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至晚唐，青龙镇已成为我国东南地区的一个外贸港口。”，由于青龙江的逐渐淤塞，青龙镇日趋衰落成为一村落。“青龙镇之衰落，则因海口东移，松江湮塞，而逐渐丧失贸易港口之利。自然条件的变迁，却为继之而起的上海港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青龙镇的衰落过程，正是上海港的兴起过程。”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设置上海镇，青龙镇的经济地位遂为上海镇所取代。元至元十四年（1277）在上海设立市舶司，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政府“以华亭地大民众难理”，分立上海县，“上海县的建置，是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明末到开埠前，上海依托江南经济中心苏州，“上海开埠前，它与这些地区（长江沿岸各地）的经济交往多由苏州沟通。尽管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顺江而下的商船多由镇江入运河至苏州成交，少有直接驶抵上海者。”

随着上海社会经济地位的日益上升，以及海禁的解除，上海大有取代苏州之势。“雍正九年（1731）清政府将分巡苏松兵备道公廨自苏州移驻此地（上海），以弹压通洋口岸。国初（清朝）官制，盖仍明旧。苏松二府，向有兵巡道，驻太仓州，巡行八郡……康熙二年（1663），兵巡为分守，苏州遂为治署。二十二年（1683），以督粮道兼领之，分守道复奉裁。今上（雍正）即

位之二年，百废具修，庶司整饬。以抚臣何公之请，复分巡苏松道如旧制。八年（1730）六月，中丞尹公上言：‘分巡道有巡缉之责，兵民皆得治之，请加兵备衙，移驻上海，弹压通洋口岸为便。’制曰：‘可’。伴随着分巡道治署移驻上海，上海的政治军事地位随之上升。

“1842 年开埠之前，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城镇群体的组成部分，是苏州的外港，其经济很大程度上从属于苏锡常地区。”因此，在开埠前形容上海经济繁荣的时谚为“小苏州”。“鸦片战争后的上海，作为一个商业港口，已经不仅仅是上海附近各县的经济中心，而且日益成长为长江三角洲以至更辽阔的长江流域甚而南中国的商业集聚地。自广州一口通商禁令解除和内向型经济格局分解，众多顺长江东下的商船不再奔赴苏州，径趋东海之滨的上海。”

以苏州为中心的传统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江南的商品通过内河水路聚集苏州，然后通过苏州经京杭大运河转运全国各地，可以说，京杭大运河是传统江南经济的命脉所系。但是，到了道光初年，“黄河改道，运河淤阻。清政府在道光六年（1826）改漕粮河运为海运”，并且，“在这前后，原来上海地区等地习惯走运河水道贩运商货的民间商贾也纷纷改走海路，从上海出口，因而运河航运日趋衰落。”运河航运的衰落直接导致了原来依赖运河航运的传统经济体系的重新整合。同时，自 19 世纪 50 年代起，西方国家对华直接贸易的重心也逐渐从南中国的广州转移到位置适中的上海，上海取代苏州成为新的商品集散地。太平天国战争后，土布市场转移到上海，盛极一时的苏州踞坊被上海所代替。

三、传统支柱产业退出市场网络

在经济中心转移的过程中，朱泾的传统家庭棉纺织手工业遭到进口洋纱、洋布的排挤，逐渐走向下坡。最终家庭棉织业被排挤出商品市场，农民也从棉织品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自机器纺织业兴起，手织土布逐渐衰落，朱泾镇四乡发展为纯水稻区。”朱泾周边已不再种植棉花，整个金山县也只在南部旱旱的地区种植少量的棉花，棉纺织品已退出市场网络。

朱泾的手工棉布业退出市场网络的直接原因是洋布和国内机制布的排挤和冲击。“自从中国同西方国家有了商务关系后，棉制品始终是进口商品中的重要项目。后来棉制品的进口甚至超过鸦片，居进口货的首位。”“洋布洋纱之入中国也，数十年于兹矣。自咸丰同治以前，每岁入口之数，不过千万而止。光绪以后（至 1896 年以前），每岁骤增，值银至六千余万，较洋药多三分之一。而土布之利，遂尽为所夺矣。”洋布进入中国后，猛烈地排挤着中国传统的土布，“所有沿海城市的较富有的阶级有时穿英国的上等棉布，夏季作便服代替绸缎，冬季作棉衣代替皮毛和厚缎，商号的职员、司帐、店铺里站柜的伙计，穿英国布的相当普遍。”人们普遍弃土布而穿着洋布，从而导致家庭手工纺织的收益锐减。“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其所赢，仅得往日之半耳。”光绪《松江府续志》也说：“近自通商以来，洋布充斥，而女红之利减矣。”“雍正乾隆之间，松江以织布富甲他郡，后夺于苏州之布，而松民失其利。近洋布行，而苏民亦失其利。”由于利润的减少，农民自然而然的要放弃棉布的手工生产。棉布业的失其利，不仅仅是该行业的衰落，而且也影响到了“本业”。“盖自谷帛贱于银，而农桑之利夺矣。农桑之利夺，而耕织之人少，耕织之人少，而谷帛之所出亦少矣。”可见洋布的输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传统经济结构受到破坏后，朱泾镇的经济需要重新整合。

朱泾的支柱产业——棉布退出市场网络与中国传统棉布市场的脆弱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传统时期棉布的全国性市场（进入长途贩运领域）商品量是较小的，一旦局部市场发生变化，棉布业将受到很大的打击。根据许涤新和吴承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夕，我国国内市场主要商品流通总量约合 3.9 亿银两，其中第一位是粮食，约占 42%；第二位是棉布，约占 24%；第三位是盐，约占 15%。”虽然棉布是第二位的商品，“但对流通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工业品（手工业品）……在鸦片战争前，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品是棉布，其商品量约为 3.1 亿匹（按标准土布每匹 3.633 平方码计），占产量的 52.8%，商品量是不孝的，但是，商品布也主要是在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上销售给非织布户，进入长距离流通的，大约不到 15%。贩运是资本积累的最主要的方式，这说明棉布的市场基础是很薄弱的，一旦受到外来棉织品的冲击，整个传统棉织品市场结构将会面临崩溃。

朱泾的棉布业退出市场网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植棉区的扩大和纺织技术的推广，抢占了其部分市场。“到明后期，棉布

逐渐取代麻布，这对人民衣着来说是个重大改进，因为棉布的性能远胜于麻布。”同时也为棉布的商品交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明代棉纺织技术尚不普及，北方产棉要运到松江府一带纺织，正如徐光启所说：“今北方之吉贝（木棉）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但是，入清以后，随着植棉区域的扩大和纺织技术的推广，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到清乾嘉时，北方已出现十来个棉布产区，其布也行销外地。”明代植棉区主要在江苏、山东、河南，清代发展到了直隶、湖北、陕西三个主要产棉省份，此外，四川、安徽、湖南、浙江也不少。奉天在清中期也已植棉。这一结果导致松江（朱泾）“标客巨商罕至”，并且“饶商（江西商人）不至”。没有商人的贩卖，朱泾的棉布失去了相当大的外地市场，利润随之降低，家庭纺织已无利可图。没有了流通也就没有生产，小农的生活日益窘迫，“天边估客无人到，门里妻孥相向啼。”商人“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如果缺乏商人参与，特别是行商，该区域的社会经济的转型要么停滞，要么发展缓慢。

中国传统棉纺织品退出市场网络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和长期没有得到改进。“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机器棉纺织工业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和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小农的棉手工业则依然故我，并无改进。”中国土布被洋布抢占市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生产技术的落后，“夫耕织为天下大利，乃尽为所夺，民生焉得不匮！彼洋商贾中国棉花，而犹能得利者，其货以机器织造，故工省而利薄。”生产技术和工具长期没有改进，原因在于“棉纺织生产局限于农民家庭之内，难以专业分化，兼以受到封建性的超经济剥削，小农根本无力也不可能革新生产工具。”另外，生产方式也相当落后，“我国自明后期起，棉布即取代麻，棉布成为人民最重要的衣被材料。清代，棉纺织已是产值最大的手工业，棉布具有仅次于粮食的广大国内市场，并出口国外。但是，直到机器纺织兴起前，我国的棉纺织业还基本上是农民家庭手工业，象包买商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到二十世纪才正式出现的……纺和织基本上没有分离。”生产工具落后，长期没有创新和改进。棉纺织过程中最重要的三个工序轧花、纺纱、织布所使用的工具，从黄道婆推广技术以来，一直到棉纺织退出家庭，几乎都没有什么改进，即使出现过提高效率的新式工具也并没有在家庭中得以推广。轧花这道工序也就是去掉棉籽，从黄道婆之前的用手工到她传授搅车技术，明代搅车仍如元式，几乎300年没有改进，清代有所改进，改称轧车，效率有所提高，“一人当四人”。但是，“这种轧车应用并不普遍，上述都是棉纺中心的松江、上海的记载。”在纺这道工序上，“在清代，除上海部分人家外，我国的手纺工具还都是沿用元、明结构的单锭手摇纺车，仅木锭改为铁锭……解放后，上海《江南土布业史》编写组同志在上海和苏、浙几县调查从事过手纺的老人，他们的父祖辈也都是用单锭手摇车。至于三锭脚车，或根本不知，或只听说而未用过。”在织这一方面，我国的织机曾发展到世界先进水平，“不过，这种投梭机历明、清并无改革。到二十世纪初，才有手拉机、铁轮机引进。”总之，“从黄道婆把棉纺织技术引入江南至清道光年500年来，其生产技术、生产形式无大的变革，始终以家庭小生产为基本业态，没有发展成手工工厂形式。”

四、结语

上海取代苏州与苏州取代松江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苏州代替松江是在传统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转移，苏州的地理位置更有利于传统商品经济的发展。朱泾镇“被纳入到以苏松为中心的江南市镇体系和全国市场网络中。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金山区域中心市镇”。而上海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不仅仅是位置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传统社会经济体系的破坏和新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经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在口岸经济的刺激下，明清以来江南形成的以苏州为中心的市镇格局发生了分化，“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江南市镇的社会转型并不是同步的，表现出不同的类型。”部分市镇依靠其地理优势和适合口岸经济贸易的自然资源，如传统的丝织业市镇，融入了上海经济体系。而部分市镇在其压力下，传统优势不复存在，逐渐被边缘化，朱泾镇就是其中之一。“城（市）镇体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也是地区内外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上海急剧发展的同时，上海附近地区的手工业棉纺织业因受进口棉纺织品倾销和新产品竞争的影响，生产不振，一度兴盛的小工商业城镇纷纷衰落。”“朱泾镇虽距离上海较近，但社会转型却十分艰难。”其“既没有纳入到江南市场网络中，更没有融入到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反而受其冲击，趋于衰落。“在区域经济中心位移的同时，受上海崛起强大引力的吸纳，长江三角洲原先以苏州为中心的城镇体系，呈现归向上海的重新组合，逐渐形成唯上海马首是瞻，以上海港内外贸易为主要联结纽带的城镇体系。”“一些原先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上海开埠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需要，依附、服务

于对外贸易和近代城市经济颇具活力的农村集镇。……原先一批立足于手工棉纺织业发展基础上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亦归于萧条。”朱泾镇之所以没有被纳入到上海经济发展体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朱泾与上海缺乏经济的关联性。上海的勃兴依靠进出口贸易和埠际转运贸易，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当是能为其提供商品的区域和各港口城市。“经由上海港出入的进出口商品特征明显，即外国机制工业品与中国农副、手工业产品间的交换。”朱泾镇自从棉布业受到冲击后，不再从事棉纺织业，其缺乏这样的可供出口的农副和手工业产品，朱泾没有成为上海对外、对内贸易的商品供应地。更为重要的是，“开埠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先起于农村的丝、茶等农副产品生产，上海地区的市场经济的先声是杭、嘉、湖等江南地区的丝、茶生产的商品化扩展和贸易的扩大。”而朱泾缺少这样的商品资源。另一方面，上海以港繁荣后，其城市的扩张力是有限的。“由于口岸、租界等市场条件的制约，上海对内经济扩散主要集中于商品、商业的扩散，制造业的扩散十分有限，限制了上海工业的发展空间……区域差距扩大，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互动互进关系减弱。”

江南经济中心的转移对江南市镇的影响是不同的，对朱泾来说，其传统的发展商品经济的优势在重新整合中逐渐丧失，朱泾与新的经济发展中心——上海没有形成互动互进的经济关系，没有纳入到上海经济发展体系中。“经济中心与其周边地区的互动是有条件和选择性的，其主要不是取决于距离远近，而是取决于两者之间社会经济关联度及其自身的发展条件。”朱泾镇在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中逐步被边缘化。“传统经济结构根深蒂固，突破传统需要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参考文献】

- [1]. 嘉庆朱泾志[M]. 嘉庆九年刻本
- [2]. 樊树志. 苏松棉布业市镇的盛衰[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7, (4).
- [3]. 乾隆金山县志[M]. 乾隆十六年刻本.
- [4]. 洪焕椿. 评刘石吉先生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J]. 学术月刊, 1984(12).
- [5]. 林刚. 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M].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9, (4).
- [6]. 安涛. 论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及其制约因素——以金山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7(3).
- [7]. 陈忠平.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J]. 江淮论坛, 1986(5).
- [8]. 官用布匹委官办解禁扰布行告示碑[A]. 上海博物馆资料室编.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 [9]. 丁日初主编. 上海近代经济史(第1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10]. 许涤新,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11]. 叶梦珠. 阅世篇[M]. 上海: 上海通社, 1935.
- [12]. 刘石吉.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13]. 道光苏州府志[M]. 道光四年刻本.

- [14]. 曾羽王. 乙酉笔记[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 清代日记汇抄[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15] 姚廷遴. 历年记[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 清代日记汇抄[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16]. &吴仁安. 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2, (3).
- [17]. 譙枢铭. 青龙镇的盛衰与上海的兴起[J]. 社会科学, 1980, (6).
- [18] 戴鞍钢. 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 [19] 程璐主编. 上海市经济地理[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8.
- [20] 新编朱泾镇志[M]. 上海: 上海浦江出版服务社代理出版, 1993.
- [21]. 彭泽益编.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1840-1949)第2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2]. 彭泽益编.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3]. 光绪嘉定县志\$[M]. 光绪八年刻本.
- [24]. 光绪松江府续志[M]. 光绪十年刻本.
- [25]. 叶廷琯. 鸥波渔话[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76.
- [26]. 唐力行.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7]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28] 徐新吾编. 江南土布史[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 [29] 樊卫国. 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